

西漢辭賦的流傳與傳說

谷口洋*

我們研究古典詩賦時，其材料來源一般為別集或總集。可是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別集之名，蓋漢東京之所創也」，¹又指出總集始於晉摯虞《文章流別集》，由此觀之，西漢以前尚未有文學專集。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雖然記載賦家之名與其篇數，但此均出於劉向的整理，不能與後代的別集一視同仁。東漢王逸《楚辭章句·離騷後敘》云：「逮及劉向，典校經書，分為十六卷。」²可見《楚辭》的編纂也出於劉向。³那麼在劉向以前成立而流傳到現在的文學專集只有一部《詩經》了。

在如此的情況之下，文學作品如何傳承下來？其具體情況各有不同，而且很難證實，但我們仍可指出其一般趨向。如果不了解西漢文學流傳過程的特質，也可能誤會文學本身的性質。本文試探西漢辭賦的流傳情況，指出文學專集成立以前的文學作品流傳的特質，以資正確理解西漢文學。

一、西漢辭賦的現存情況與其特徵

首先把西漢辭賦的現存情況概觀一下。

現存的西漢辭賦究竟有多少篇？這是漢賦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，其實回答此問並不簡單。馬積高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指出：「包括殘篇在內，西漢僅存八十餘篇（內全者 67 篇），東漢僅存百二十余篇（內全者 41 篇）」。⁴馬氏說明這個統計主要是依據嚴可均輯《全漢文》，同時又承認「實際現存的兩漢辭賦與之有出入」。據馬氏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嚴氏失收，其

* 谷口洋現職為奈良女子大學教授。

¹ 《隋書·經籍志四·集部別集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），頁1081。

² 見於〔宋〕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48。

³ 由於《漢志》不載《楚辭》16卷，因此有人懷疑其存在，可是《漢志》著錄《屈原賦二十五篇》、《宋玉賦十六篇》等，那麼至少可以肯定劉向從事屈、宋等作品的整理工作，其中應有楚辭體作品。

⁴ 馬積高：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42。

中有嚴氏未能見者（如最近的出土文獻），亦有嚴氏漏收的；二是嚴氏所收又可能有真偽可疑的。

其實還有一個複雜的問題：甚麼算是賦？近來有幾種漢賦總集或漢賦目錄，但其收錄範圍頗有不同，因此作品篇數也有出入。蹤凡《漢賦研究史論》云，嚴可均輯得的漢人賦作多達「75家，258篇」，⁵雖然同樣地依據嚴輯，結果卻與馬氏不一致。本人試依費振剛等編《全漢賦校注》⁶的篇目計算，西漢賦有71篇（包括佚名〈神鳥賦〉），東漢賦有132篇（不包括建安賦116篇）。萬光治〈漢賦今存篇目敘錄〉，⁷「西漢之什」有100篇，「東漢之什」有157篇，「建安之什」收錄195篇。費書體例嚴格，除了以賦名篇的作品以外，僅收七、設論等；萬著以廣為旨，也收錄《楚辭》所收的篇章以及部分頌、銘、辭、歌等。他們所收的篇數均與馬氏的統計很不一致，可見賦的界限不易劃定。

雖然有如上複雜的問題，可是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兩漢辭賦的基本現存情況。無論依據哪種統計，東漢賦的現存篇數都比西漢賦多五成以上。但是，如馬氏所指出，就完篇而言，西漢賦竟比東漢賦多。這表示現存的西漢賦以比較少數的完篇為中心，東漢賦卻包含多數殘篇或存目。建安賦的情況與東漢賦相似，萬氏〈敘錄〉「建安之什」中，指出「已殘」「已佚」者竟達128篇之多，佔三分之二。

如此有趣的現象，是由於兩漢辭賦流傳方式的不同。現存的西漢賦，除了《文選》、《楚辭章句》等文學總集之外，多載於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史書中作者本傳，而這種史書基本上完整地保存著作品的文本。東漢賦也有載於《後漢書》作者本傳的，但是載於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等類書的卻為數居多。至於建安賦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本傳不載他們的辭賦，最重要的出處就是類書。類書的引用一般是摘錄，那麼建安賦的殘篇可能比萬氏所指出多得多，或許大部分不是完篇。

總之，從現存情況來看，西漢辭賦的主要流傳渠道是史書，東漢辭賦的主要流傳渠道是類書。這個差別意味著甚麼，是令人深思的一個問題。

⁵ 蹤凡：《漢賦研究史論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45。蹤氏是包括建安賦而計算的，馬氏未註明包括建安賦與否，但無論如何二者不能一致。

⁶ 費振剛、仇仲謙、劉南平校注：《全漢賦校注》（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
⁷ 萬光治《漢賦通論》附錄，今依修訂本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二、「以文傳人，以人傳文」：《史記》中的辭賦與傳說

在文學專集尚未出現的情況下，我們能看到的先秦到西漢的辭賦歌謠多保存在史籍或子籍中。但是此等書籍的企圖並不在於蒐集文學作品本身，而在於收錄歷史故事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司馬遷為了記述伯夷、叔齊的事蹟引用一段「傳」，其中包括一首歌：

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軼詩可異焉。其傳曰：

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齊，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：「父命也。」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、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，盍往歸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，號為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、叔齊叩馬而諫曰：「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」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「此義人也。」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，作歌。其辭曰：「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遂餓死於首陽山。⁸

司馬遷的確說「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軼詩可異焉」，十分肯定他們的歌詞的深刻內容，並對此表示同情。但是這首歌與伯夷、叔齊的傳說合在一起才發揮作用，而司馬遷的目的也在於記述圍繞他們的「傳」。在這裡，歌與傳說融為一體，形成一個歌謠故事。它既敘述伯夷、叔齊的生平，又顯示他們的高尚人品與不滿情緒，正是古代「文史不分」的典型表現。⁹

《史記》還有另一種情況。〈魯仲連鄒陽列傳〉是兩人合傳，其中魯仲連的傳記又可分為兩大段，前半段記錄魯連與新垣衍的論爭，後半段載魯連寄給燕將的一篇書。俱以魯連本人的語言為主，尤其是後一段：

燕將攻下聊城，聊城人或讒之燕，燕將懼誅，因保守聊城，不敢歸。齊田單攻聊城歲餘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。魯連乃為書，約之矢以射城中，遺燕將。書曰：……（頁 2465）

如此簡單地說明背景之後，司馬遷就引用魯連的書的全文，最後補充它帶來的結果：

⁸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第2122-23頁。

⁹ 關於《史記》中的歌謠，參見拙稿〈論《史記》中秦末漢初的歌謠與傳說—圍繞荊軻、項羽、劉邦、呂后的帶歌謠的故事〉，《中國文學報》第78冊（2009年），第1-53頁。

燕將見魯連書，泣三日，猶豫不能自決。欲歸燕，已有隙，恐誅；欲降齊，所殺虜於齊甚眾，恐已降而後見辱。喟然歎曰：「與人刃我，寧自刃。」乃自殺。聊城亂，田單遂屠聊城。歸而言魯連，欲爵之。魯連逃隱於海上，曰：「吾與富貴而詘於人，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。」（頁 2469）

書的引用佔著八百多字，史文只有 150 字左右，可見其重點之所在。據其所說，一年以上攻不下的聊城，由魯連的一篇書就陷落了。司馬遷之收錄這篇書，與其說為的是記述魯連的生平或當時的歷史事實，毋寧說為的是表揚這篇書在歷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，以及著者魯仲連的偉大人格。這篇書不僅僅是一篇史料，而是歷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說歷史就在此。與此同時，魯仲連的「蕩然肆志」¹⁰也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魯連的書與伯夷、叔齊的歌不同，篇幅也大，文本的獨立性也強，可是同樣地與作者的形像相結合，形成「文史不分」的表現模式。

此後附載的鄒陽的傳記也有同樣的性質：

鄒陽者，齊人也。游於梁，與故吳人莊忌夫子、淮陰枚生之徒交。上書而介於羊勝、公孫詭之間。勝等嫉鄒陽，惡之梁孝王。孝王怒，下之吏，將欲殺之。鄒陽客游，以讒見禽，恐死而負累，乃從獄中上書曰：……（頁 2469）

如此簡單的記載之後，就引用近 1500 字的上書，最後的結局只有如下一句：

書奏梁孝王，孝王使人出之，卒為上客。（頁 2478）

《史記》關於鄒陽的記述就是如此，未涉及到鄒陽的其他事蹟。司馬遷在〈贊〉裡說：「鄒陽辭雖不遜，然其比物連類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謂抗直不撓矣，吾是以附之列傳焉。」可見立傳的用意就在於上書本身。與魯連的書相比，鄒陽的上書沒有歷史上的作用，只能拯救自己的困境而已。於是傳記的主題大大傾向於「文」的方向，可以說「以書傳人」。

但是，一篇上書不能單獨形成列傳，如此簡單的鄒陽傳的背後，也應該有圍繞鄒陽其人的某種傳說。由讒言被陷入困境，歷史上不乏其例；在困境寫書，與「發憤著書」的古人一脈相通；以上書擺脫危機，與戰國辯士靠辯論打開僵局一樣。鄒陽在當時被認為以自己的語言能力克服困難的

¹⁰ 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·贊》：「太史公曰：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，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，蕩然肆志，不詘於諸侯，談說於當世，折卿相之權。」（頁 2479）

了不起的人，因此才能名垂青史了。如此來看，《史記》收錄〈獄中上書〉，也可以說「以人傳書」。

《史記》收錄辭賦，也是「以賦傳人，以人傳賦」。〈屈原賈生列傳〉編在〈魯仲連鄒陽列傳〉之後，兩篇相連，可見司馬遷的用意。這兩篇的構思完全一樣，都配合不同時代的兩個人物，而且都以他們所寫的篇章為中心。

〈屈原傳〉的材料來源比〈魯連傳〉、〈鄒陽傳〉複雜得多，如「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」以下幾句出於劉安〈離騷傳〉，¹¹「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」以下一段《楚辭章句》以〈漁父〉的標題編為屈原的作品。雖然如此，這些材料均說明屈原的困境。司馬遷最後引用〈懷沙之賦〉，引出「於是懷石，遂自沈汨羅以死」的結局。雖然後代的研究者多否定以〈懷沙〉為屈原絕筆的說法，可是在司馬遷所寫的屈原傳中，〈懷沙〉的引用形成自沈的悲劇的核心部分。對〈懷沙〉的這種看法，大概不是司馬遷的個人見解，而是當時流行的傳承。

在〈賈誼傳〉，司馬遷敘述賈誼早年平步青雲而被讒左遷，然後引用其〈弔屈原賦〉與〈服鳥賦〉，其構思與屈原傳如出一轍。就事實而言，賈誼數年之後被召回，¹²拜梁懷王太傅。司馬遷也云：「梁懷王，文帝之少子，愛，而好書，故令賈生傳之。」¹³據此，賈誼雖然不在帝王身邊，可是基本上恢復了皇帝的信賴。以後他對文帝提出德化匈奴、抑制諸侯王等很多方面的建議。《漢書·賈誼傳》較全面地介紹其情況，引用幾篇長篇上書，以顯示賈誼政治上的貢獻。可是《史記》只載他反對封淮南厲王四子而不被採納這一件，強調其不遇。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·贊》很明顯地展示司馬遷對賈誼的看法以及立傳的意圖：

太史公曰：余讀〈離騷〉、〈天問〉、〈招魂〉、〈哀郢〉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為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〈服鳥賦〉，同死生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（頁 2503）

¹¹ 班固〈離騷序〉（收於《楚辭章句·離騷後敘》之後）：「淮南王安敘〈離騷傳〉，以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」云云。見《楚辭補注》，頁 49。

¹² 《史記》云：「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，有鵲飛入賈生舍……乃為賦以自廣。」（頁 2496）又云：「後歲餘，賈生徵見。」（頁 2502）據此，賈誼在長沙的時間為四年多。其實賈誼在長沙的時間與〈服鳥賦〉的寫作時間均有糾紛，詳見王興國《賈誼評傳》（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頁 56-67。但無論如何，賈誼在數年之內被召回而見文帝。

¹³ 《史記》，頁 2503。

賈誼並非像屈原那樣自沈湘水，可是司馬遷指出其賦「同死生，輕去就」。以弔屈作賦這一故事為端緒，賈誼獲得了「當代屈原」的形象。〈屈原賈生列傳〉的一文集中地表現這一點：「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為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」¹⁴司馬遷就靠這個形象寫出了其賈誼傳，〈弔屈〉〈服鳥〉二賦也由此流傳到現在。

在如上的環境之下，司馬遷給當代大賦家司馬相如寫出列傳時採用「以賦傳人，以人傳賦」的方法，是最自然的事。其實〈司馬相如列傳〉的內容相當複雜，比如圍繞卓文君的情節與辭賦無涉。其云「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」，¹⁵如此形象也與司馬遷強調相如作品的諷諫有所矛盾。對這些問題，本人另有專論，¹⁶此不贅述。但是，就整體而言，〈司馬相如列傳〉全面地展開「以賦傳人，以人傳賦」的方法，結果保存了相如的多篇作品。

在古代，口頭的傳說就是最重要的傳承媒體。連上書、辭賦等書面文本，也伴隨傳說而後才能夠流傳到後代。司馬遷深知傳說的價值，給「作者」寫出傳記時全面地採用了他們的傳說，完整地保存了他們的作品，而如此的作法成為後代史家的典範了。儘管《史記》所收漢賦只有賈誼、司馬相如兩人之作而已，可是我們毫不躊躇地說，它對漢賦的整理與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
三、傳說·自序·文集：兩漢辭賦流傳模式的轉變

《史記》以後，「以賦傳人，以人傳賦」的情形仍然在。《漢書》所載的辭賦均在這個模式中。《漢書》全部收入《史記》所收的漢賦以外，又增加了幾篇作品。其中漢武帝的〈李夫人賦〉被收錄於〈外戚傳·上〉，前面又附載李夫人去世後的怪話：

上思念李夫人不已，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。乃夜張燈燭，設帷帳，陳酒肉，而令上居他帳，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還幄坐而步。又不得就視，上愈益相思悲感，為作詩曰：「是邪，非

¹⁴ 《史記》，頁 2491。

¹⁵ 同上註，頁 3053。

¹⁶ 本人對〈司馬相如列傳〉的看法，已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，如〈西漢人如何接受相如賦？一論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的多重性〉（第九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，泉州，2011年）、〈再論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—司馬遷如何看相如其人其賦？〉（辭賦理論與文類研究：國際賦學研究會學術論壇，新加坡，2012年）、〈口吃與消渴〉（蟠桃會，京都，2013年）等。其中〈口吃與消渴〉一文被收入於劉苑如主編《桃之宴—京都桃回與漢學新詮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14年）第 127-147 頁，其他論文目前尚未刊出。

邪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姍姍其來遲！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。上又自為作賦，以傷悼夫人。¹⁷

這簡直是說方士騙皇帝，其作法也太可笑，但我們由此可見，武帝對李夫人的愛慕是由這種小說似的方式傳承下來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一段除了賦以外也載詩。詩很簡短，大概是由口頭即席唱出的；賦相當長，應該是經過熟思而用筆札寫出的（甚至有可能文人代作或潤色）。但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本，在此同樣地在傳說中流傳。

〈外戚傳〉又載班婕妤的〈自悼賦〉，該賦與趙飛燕姊妹得幸、班婕妤失寵的宮廷秘史有關。圍繞後宮的兩篇賦被收錄於正史，就表示西漢末期外戚的勢力強大了，宮廷秘史很容易影響到政治。

但是，《漢書》一百卷中與辭賦關係最密切的，莫過於〈揚雄傳〉。該傳首先引用〈反離騷〉而交代揚雄對屈原的傾倒，接著連續引用〈甘泉〉、〈河東〉、〈校獵〉、〈長楊〉四賦而敘述他在宮廷的言論活動，然後以〈解嘲〉、〈解難〉展示輟賦筆而埋頭於《太玄》的晚年的心境。〈揚雄傳〉的如此筆法實在稱得起「以賦傳人」，同時該傳保存揚雄的主要作品，真是「以人傳賦」，看來是西漢辭賦流傳模式的最完美的例子。《漢書》的著者班固按照這個模式，在〈敘傳〉敘述自己的生平時引用〈幽通賦〉、〈賓戲〉這兩篇自作的賦。

其實，〈揚雄傳〉與上面論及的西漢諸傳迥然不同。〈揚雄傳·贊〉的開頭一句就說：「雄的自序云爾。」¹⁸這與〈司馬遷傳〉全取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之後的「遷之自敘云爾」一句相同，表示〈揚雄傳〉根據揚雄的〈自序〉。就作品的傳承方式而言，這一點就是關鍵性的變化。揚雄以前的辭賦，都是與時人或後人所談的傳說相結合而流傳下來的，至於揚雄，才開始作者談自己，說明自己的作品。而東漢以後這就成為普通的事，正如班固在《漢書·敘傳》中引用自己的作品而談自己。¹⁹

《後漢書》也收錄十多篇辭賦，其數量並不亞於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。其中的確有一群篇章與作者的人品融為一體，形成一個傳說而流傳，正如《史》、《漢》所載的辭賦一樣。如崔篆以拜偽新大官為恥，不仕東漢，杜門不出，臨終時作〈慰志賦〉。又如趙壹為人倨傲，不為鄉里所容，甚至多次抵罪。幸而得到友人拯救，作〈窮鳥賦〉以表示感謝，又作〈刺世疾邪

¹⁷ [漢]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頁3952。

¹⁸ 同上註，頁3583。

¹⁹ 關於揚雄〈自序〉的歷史意義，參見拙稿：〈試論兩漢「賦序」的不同性質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8卷第2期（2008年），頁29-35。本文以下所論與此文相關，可以互補。

賦〉以抒發憤懣。這兩人不是以政治上、社會上的功績，而是以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大受稱讚，世世相傳，以至載入史冊，其作品也載於史書了。梁竦〈悼騷賦〉、禰衡〈鸚鵡賦〉等，儘管未載於《後漢書》，也可視為這一類。²⁰

可是《後漢書》所載的賦另有一類。杜篤〈論都賦〉及班固〈兩都賦〉以圍繞東西兩京之優劣的爭論為內容，馬融〈廣成頌〉以狩獵賦的體裁論蒐狩之禮不可廢，均有針對時事的政治目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篤、馬融均在作品前面附上長篇上書而說明自己的寫作意圖，班固的作品也有長大的序。²¹揚雄晚年認為作賦「頗似俳優淳于髡、優孟之徒」²²而輟筆，東漢人與此不同，作者把它看做一篇著述一樣，寫賦時對社會宣明自己的立場。

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如上帶政治性的作品。馮衍〈顯志賦〉雖然是抒發個人心情的「賢人失志」之作，可是前面卻附帶著長大的〈自論〉。張衡〈思玄賦〉也是「賢人失志」之作，但篇幅長達兩千七百多字，佔著〈張衡傳〉的一半，內容上也融合儒、道，結合天文與歷史，稱得起一篇哲理著作。《後漢書》所載班固〈賓戲〉、崔駰〈達旨〉、張衡〈應問〉、蔡邕〈釋誨〉等 4 篇設論，也與西漢東方朔〈答客難〉、揚雄〈解嘲〉均為遊戲文字不同，正面表明作者的人生觀。

如上的自我意識在東漢初期特別明顯，後來逐漸變為對自己的作品的意識。馬融的〈長笛賦〉、王延壽〈魯靈光殿〉均屬於詠物賦，未載入《後漢書》而始見於《文選》。有趣的是，這兩篇都有序，²³說明其寫作緣起。

²⁰ 〔南朝宋〕范曄：《後漢書·梁竦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頁1170：「後坐兄松事，與弟恭俱徙九真。既徂南土，歷江、湖、濟沅、湘，感悼子胥、屈原以非辜沈身，乃作〈悼騷賦〉，繫玄石而沈之。」《後漢書》不載其賦，章懷注引《東觀記》而載之。又〈文苑傳下·禰衡〉云：「射時大會賓客，人有獻鸚鵡者，射舉危於衡曰：『願先生賦之，以娛嘉賓。』衡攬筆而作，文無加點，辭采甚麗。」（頁2657）射，黃祖長子。其文見《文選》。

²¹ 《後漢書·班固傳》只載〈兩都賦〉本文而不載序，但是傳文云：「時京師脩起宮室，濬繕城隍，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。固感前世相如、壽王、東方之徒，造構文辭，終以諷勸，乃上〈兩都賦〉，盛稱洛邑制度之美，以折西賓淫侈之論。」（頁1335）此段的內容與《文選》所載〈兩都賦序〉一致，范曄準是依〈序〉寫傳文的。

²² 《漢書·揚雄傳下》，頁3575。

²³ 〈長笛賦序〉用第三人稱，或許是後人附上的，但其文云「追慕王子淵、枚乘、劉伯康、傅武仲等簫、琴、笙頌，唯笛獨無，故聊復備數，作〈長笛賦〉」〔梁〕蕭統編：《文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胡克家刻本，2003年）卷18第1頁b，第255頁），列舉前人的作品，頗似班固〈兩都賦序〉、崔駰〈達旨序〉等東漢自序。馬融有〈自序〉（見於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注），自序一般用第三人稱，因此〈長笛賦序〉可能出於馬融〈自序〉。〈魯靈光殿賦序〉用第一人稱，可視為王逸的自序。

這種賦雖然沒有政治上或思想上特別的主張，可是意識到非特定的多數讀者而進行整理工作，可見東漢人很關心作品如何流傳到後代。²⁴

如此的意識對別集的出現做下了很好的準備。東漢後期的蔡邕，《後漢書》本傳只載〈釋誨〉一篇，但類書徵引的有 15 篇。〈蔡邕傳〉云：「所著詩、賦、碑、誄、銘、讚、連珠、箴、弔、論議、《獨斷》、《勸學》、〈釋誨〉、〈敘樂〉、〈女訓〉、〈篆勢〉、祝文、章表、書記，凡百四篇，傳於世。」²⁵蔡邕是個文化名人，其作品應該廣泛地流傳，大概去世後逐漸結集而編為集子。至於建安，編文集成為風氣，以後文集就成為保存與流傳文學作品的最普通的手段了。東漢作者自我意識的高潮與對自作的關心，在此得到了較穩定的形式。《隋志》所云「別集之名，蓋漢東京之所創也」，正反映著如此的情況。

四、西漢辭賦在梁代到隋代流傳情況的揣測

在魏晉南北朝，文集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流傳手段以後，漢人的作品也編為別集。另有總集收錄歷代的作品，其中也應有漢代的作品。魏晉南北朝以後的漢賦的流傳情況雖不明白，但我們仍可據目錄的記載做出一些揣測。

《隋志》別集類著錄西漢別集 15 種，東漢別集 35 種（包括建安文人）。它又據梁代阮孝緒《七錄》註明隋代已亡而梁代尚有的集子，如把它合算，西漢共有 26 種，東漢共有 75 種。總集類也有謝靈運《賦集九十二卷》、梁武帝《歷代賦十卷》等辭賦專集。現存的《文選》以及唐初類書，當是在這些整理工作之上成立的。

令人遺憾的是，六朝人蒐集漢賦而編為文集時，很多漢賦已經散失了。我們無法掌握六朝時期有多少篇漢賦流傳，但《漢志》所著錄的西漢辭賦作家原有 61 家（不包括佚名的雜賦類），可見《隋志》所載已多遺失。東漢賦的情況難以澄清，但清代姚振宗《後漢藝文志》別集類舉 93 家，《隋志》的數目也遠不及此。

就《隋志》及原註所舉的西漢 26 家²⁶而言，其中已見於《漢志·詩賦略》者 11 人，²⁷有辭賦作品流傳至今者 13 人，²⁸不僅二者基本一致，而且

²⁴ 關於東漢賦序的轉變及其意義，參見拙稿：〈漢末魏晉賦序興旺的背景——文學文本的整理與「文學自立」〉，《中國賦學》第 2 輯（2012 年），頁 406-419。

²⁵ 《後漢書》，頁 2007。

²⁶ 《隋志》本文有漢武帝、淮南王、司馬遷、東方朔、司馬相如、董仲舒、李陵、王褒、劉向、谷永、師丹、息夫躬、揚雄、劉歆、班婕妤，共 15 家。原註標明的是賈誼、晁錯、枚乘、吾丘壽王、孔臧、魏相、張敞、陳湯、韋玄成、杜鄴、李尋等 11 家。

現存西漢辭賦的作者基本上均在此內。見於《全漢賦校注》而不見於此者，有陸賈、鄒陽、公孫乘、路喬如、公孫詭、羊勝、盛覽、慶虯之、劉勝、馮商 10 人，²⁹其實鄒陽至劉勝 8 人均初見於《西京雜記》（此 8 人也不見於《漢志》，這一點涉及到《西京雜記》的可靠性，見後），馮商僅見於「劉向別傳」，³⁰只有陸賈之名見於《文心雕龍》。³¹這表示，齊梁到隋唐的人能看到的西漢辭賦的範圍，基本上與現代的我們沒有很大的差別。

據《全漢賦校注》的篇目而計算，現存的西漢賦文本共有 54 篇（除存目 16 篇與新出土的〈神鳥賦〉），其中見於《史記》者有 7 篇，³²《漢書》增加了 11 篇³³（不包括〈敘傳〉中班固的作品），見於《西京雜記》者 8 篇，³⁴見於《孔叢子》者 4 篇，³⁵共有 30 篇出現於晉代以前的文獻（《西京雜記》、《孔叢子》的內容雖不無問題，但總是晉代以前成書的）。至於齊梁以後的文獻，不見於史書而始見於《文選》者有 3 篇，³⁶不見於先唐文獻而初見於初唐類書（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）者 14 篇，³⁷初見於《文選》李善注者 5 篇，³⁸其他 2 篇。³⁹就西漢賦存目 16 篇而看，《漢書·

²⁷ 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淮南王、孔臧、吾丘壽王、上（即漢武帝）、劉向、王褒、司馬遷、揚雄。還有東方朔見於〈諸子略·雜家〉。

²⁸ 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淮南王、孔臧、上（即漢武帝）、司馬遷、東方朔、王褒、劉向、劉歆、揚雄、班婕妤。

²⁹ 包括楚辭體作品而言，《哀時命》的作者嚴忌與《招隱士》的作者淮南小山也不見於《隋志》，但他們均見於《漢志》（《招隱士》蓋在「淮南王群臣賦」之中）。他們的作品，除了《楚辭章句》所收的這兩篇以外，大概是在齊梁以前都散失了。

³⁰ 〔唐〕歐陽詢：《藝文類聚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65 年）卷 80，頁 1368：「《劉向別傳》曰：待詔馮商作〈燈賦〉。」其文不傳。按：「別傳」或是《別錄》之誤。

³¹ 〔梁〕劉勰：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：「漢室陸賈，首案奇采，賦孟春而選典誥，其辯之富矣。」其文不傳。（范文瀾註本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8 年），頁 698。

³² 賈誼〈弔屈原賦〉、〈服鳥賦〉、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、〈哀二世賦〉、〈大人賦〉、〈難蜀父老〉。

³³ 漢武帝〈李夫人賦〉、東方朔〈非有先生論〉、〈答客難〉、揚雄〈甘泉賦〉、〈河東賦〉、〈羽獵賦〉、〈長楊賦〉、〈酒賦〉、〈解嘲〉、〈解難〉、班婕妤〈自悼賦〉。

³⁴ 枚乘〈柳賦〉、鄒陽〈酒賦〉、〈几賦〉、公孫乘〈月賦〉、路喬如〈鶴賦〉、公孫詭〈文鹿賦〉、羊勝〈屏風賦〉、劉安〈屏風賦〉。

³⁵ 孔臧〈諫格虎賦〉、〈楊柳賦〉、〈鴉賦〉、〈蓼蟲賦〉。

³⁶ 枚乘〈七發〉、司馬相如〈長門賦〉、王褒〈洞簫賦〉。

³⁷ 賈誼〈早雲賦〉、〈虞賦〉、枚乘〈梁王菴園賦〉、劉安〈屏風賦〉、司馬相如〈美人賦〉、董仲舒〈士不遇賦〉、司馬遷〈悲士不遇賦〉、劉向〈雅琴賦〉、揚雄〈蜀都賦〉、〈逐貧賦〉、劉歆〈遂初賦〉、〈甘泉宮賦〉、〈燈賦〉、班婕妤〈擣素賦〉。其中劉歆〈遂初賦〉也見於《水經注》（卷 6〈汾水〉及卷 9〈沁水〉），但均為片言，不如《類聚》卷 27 之較為完整。

³⁸ 司馬相如〈梨賦〉、王褒〈甘泉賦〉、劉向〈圍棋賦〉、揚雄〈太玄賦〉、〈覈靈賦〉。

³⁹ 司馬相如〈桐柏山賦〉見於《玉篇》，劉向〈清雨華山賦〉僅見於《古文苑》。

枚皋傳》云枚皋與東方朔各有〈皇太子生賦〉，諸書所引劉向之語有 8 篇題目，⁴⁰均為漢人所言，而後人所補相對地少。

與此相比，東漢賦《漢書·敘傳》載班固的 2 篇，⁴¹《後漢書》載 12 篇，⁴²載於劉宋以前的文獻者只有 14 篇。初見於《文選》者有 10 篇，⁴³其他大多數是由類書的摘錄流傳到現在的。此等數字意味著甚麼呢？我們推測：這表示西漢辭賦中載於史書的作品在魏晉以前已獲得了高度評價，其他的文本容易被淘汰，齊梁以後的人蒐集的餘地相對地小；東漢辭賦的淘汰不至於此，文本的保存情況比較好，因此很多作品被類書徵引。

這當然是由於年代的遠近，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兩漢辭賦寫作情況、流傳方式等有所不同。西漢賦家多陪同君王，在宮廷裡活動。如《漢書·枚皋傳》云：「上有所感，輒使賦之。」⁴⁴〈嚴助傳〉也云：「有奇異，輒使為文。」⁴⁵可見他們專門為一個皇帝寫作，其作品多為即席寫作，甚至可以說是一次性的。他們的地位也相對地低，枚皋自悔其類俳倡，《漢志》的不少賦家連其姓也不詳，如云：「臣說賦九篇」、「臣吾賦十八篇」等。⁴⁶既然他們陪同皇帝，其作也可能留在秘府，其名也可能載於《漢志》。可是此等作品與歷史背景不大相關，其作者也不是歷史名人，因此經過時間很容易被遺忘，以致散佚。東漢賦家就與此相反，作者已有明顯的自我意識，既意識到自作的存在意義，又意識到非特定而多數的讀者。《後漢書》列傳的末尾常有其人的著作簡目，如上文所引〈蔡邕傳〉。這當然出於范曄當時的關心，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東漢人自己也關心自作的整理。

總之，西漢辭賦與東漢辭賦在魏晉南北朝的保存情況有所不同，其原因是：東漢辭賦的寫作意識與流傳方式已接近於後代的文人，較多的作品以文集的形式流傳到後代；西漢辭賦卻與此不同，與傳說相結合才得以廣泛流傳，較少數的名篇在歷史故事中流傳下來。我們在上文已指出：西漢

⁴⁰ 劉安〈薰籠賦〉、劉向〈芳松枕賦〉、〈麒麟角杖賦〉、〈合賦〉、〈行過江上弋鴈賦〉、〈行弋賦〉、〈弋得雌雄賦〉等 7 篇見於劉向《別錄》（見《北堂書鈔》或《太平御覽》），馮商〈燈賦〉見於《劉向別傳》（註 30）。

⁴¹ 〈幽通賦〉、〈答賓戲〉。

⁴² 崔篆〈慰志賦〉、馮衍〈顯志賦〉、杜篤〈論都賦〉、崔駰〈達旨〉、班固〈西都賦〉、〈東都賦〉、張衡〈思玄賦〉、〈應間〉、趙壹〈窮鳥賦〉、〈刺世疾邪賦〉、邊讓〈章華臺賦〉、蔡邕〈釋誨〉。

⁴³ 班彪〈北征賦〉、班昭〈東征賦〉、傅毅〈舞賦〉、馬融〈長笛賦〉、張衡〈西京賦〉、〈東京賦〉、〈南都賦〉、〈歸田賦〉、王延壽〈魯靈光殿賦〉、禰衡〈鸚鵡賦〉。

⁴⁴ 《漢書》，頁 2367。

⁴⁵ 同上註，頁 2790。

⁴⁶ 同上註，頁 1749。

辭賦的主要流傳渠道是史書，東漢辭賦的主要流傳渠道是類書，這也是如上情況的結果。

五、古小說與西漢辭賦：《西京雜記》所載賦與《長門賦》

由於西漢辭賦與作者的傳說相結合，因此名人的名篇得以收入史書，對後代的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幸福。可是，同一個事實也會對我們帶來了一些麻煩。

《西京雜記》載西漢賦 8 篇，為數不少。其他還有幾條關於漢賦的傳說，實為寶貴。但由於《西京雜記》的成書不無問題，因此這 8 篇的真偽也有爭論。其實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書的真偽，卻在於這些賦與「文史不分」的傳說合在一起。

《西京雜記》所載 8 篇賦中 7 篇集中在於同一條記載裡。在梁孝王的「忘憂之館」會聚了枚乘、路喬如、公孫詭、鄒陽、公孫乘、羊勝、韓安國等 7 個人作賦，韓安國寫不成，鄒陽代作。結果鄒陽、韓安國罰酒，枚乘、路喬如得獎。他們所寫的賦都插在這個故事裡。

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，集諸遊士，各使為賦。枚乘為〈柳賦〉，

其辭曰：……。

路喬如為〈鶴賦〉，其辭曰：……。

公孫詭為〈文鹿賦〉，其詞曰：……。

鄒陽為〈酒賦〉，其詞曰：……。

公孫乘為〈月賦〉，其辭曰：……。

羊勝為〈屏風賦〉，其辭曰：……。

韓安國作〈几賦〉，不成，鄒陽代作，其辭曰：……。

鄒陽、安國罰酒三升，賜枚乘、路喬如絹，人五匹。⁴⁷

情節雖然簡單，可是有頭有尾的一個故事，可謂是關於西漢賦的寶貴資料。但是把它與各種史料互相對照，卻未嘗沒有問題。上文已指出，這 7 篇賦的 6 人作者，以枚乘為唯一的例外，均不見於《漢志·詩賦略》，何況於《隋志》。他們不是漢臣，而是梁王賓客，因此其作或許未被奉獻於漢朝秘府。但《漢志》著錄「淮南王賦八十二篇」、「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」，⁴⁸卻沒著錄枚乘以外的梁王群臣賦，這一點是令人費解的。而且，據《史記·

⁴⁷ [漢]劉歆撰、[晉]葛洪集，向新陽、劉克任校註：《西京雜記校註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卷4，頁173-191。

⁴⁸ 《漢書》，頁1747。

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，鄒陽曾為公孫詭、羊勝所陷，這三人如此愉快地作賦，是不大可能的。

枚乘、鄒陽他們的名字，在漢代似乎聯繫著吳楚七國之亂。《史記》沒有枚乘傳，鄒陽的傳記也很簡單，但《漢書·鄒陽傳》云：「吳王不內其言。是時，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，亦待士。於是鄒陽、枚乘、嚴忌知吳不可說，皆去之梁，從孝王游。」⁴⁹〈枚乘傳〉亦云：「吳王不用乘策，卒見禽滅。漢既平七國，乘由是知名。」⁵⁰他們被視為戰國游士那樣敢說敢幹的硬骨頭，《史》《漢》有時尊敬地稱枚乘為「枚生」，⁵¹可知時人對他的尊敬。枚乘〈七發〉雖然不收於史書，但與他的如此形象很一致，因此得以流傳，最後完整地收入《文選》了。《西京雜記》這一段的形象與此迥異，如果在戰國時代找類似的例子，就是宋玉那樣的宮廷文人。

說到宋玉，我們不能不看《古文苑》所收的〈大言賦〉〈小言賦〉，因為其結構、內容與《西京雜記》的這一段完全相同。試看〈大言賦〉：

楚襄王與唐勒、景差、宋玉遊於陽雲之臺。王曰：「能為寡人大言者，上座。」王因唏曰：「操是太阿剝一世，流血沖天，車不可以厲。」至唐勒，曰：「壯士憤兮絕天維，北斗戾兮太山夷。」至景差，曰：「校士猛毅臬陶嘻，大笑至兮摧覆思。鋸牙雲，晞甚大，吐舌萬里唾一世。」至宋玉，曰：「方地為車，圓天為蓋，長劍耿耿倚天外。」王曰：「未也。」玉曰：「并吞四夷，飲枯河海，跋越九州，無所容止。身大四塞，愁不可長。據地■天，迫不得仰。」⁵²

《古文苑》的成書也有問題，但銀雀山漢簡〈唐勒〉殘篇的結構也是同樣的，因此我們至少可以相信秦漢之交已有如此的體裁。《古文苑》把它視為宋玉作的 1 篇賦，《西京雜記》的那一段是包括 6 人所作的 7 篇賦的一個故事，其實二者的差別只是各個韻文部分的長短與篇題的有無而已。

本文之旨不在於討論《西京雜記》所記的真實性，也不在於討論《西京雜記》所收漢賦的真偽問題。上述的各種問題，均不能算作判斷其真偽的確鑿的證據。我們不能以不見於《漢志》為理由而否定梁王群臣作賦的

⁴⁹ 《漢書》，第 2343 頁。

⁵⁰ 同上註，第 2365 頁。

⁵¹ 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：「游於梁，與故吳人莊忌夫子、淮陰枚生之徒交。」（第 2469 頁）《漢書·公孫弘卜式兒寬傳·贊》：「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，始以蒲輪迎枚生，見主父而歎息。」（第 2633 頁）

⁵² 《古文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影印守山閣叢書本，1985 年）卷 2，頁 58-59。

事實性。這裡所載的賦均為整齊的四言賦，而〈神鳥賦〉的出土證明西漢時已有比較整齊的四言賦，因此我們也不能輕易地否定其真實性。

就目前的問題而說，《西京雜記》以及其所載賦的真偽問題是次要的。重要的是，《西京雜記》的這一段形成有頭有尾的一個故事，而其體裁與宋玉賦十分相似。這就表示「記」與「賦」均以傳說為核心，立足於「文史不分」的書寫模式。

至於司馬相如的〈長門賦〉，問題更突出。此賦不見於史書，初見於《文選》。可是其序云：

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，頗妒。別在長門宮，愁悶悲思。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，奉黃金百斤，為相如文君取酒，因于解悲愁之辭。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，陳皇后復得親幸。⁵³

陳皇后奉金買賦是否屬實，可以暫且不提；至於她復得親幸，明顯地違背史實。由此疑竇叢生，這篇賦曾被懷疑為偽作。

其實，序的真偽與賦的真偽是兩個問題。簡宗梧教授分析〈長門賦〉的用韻，指出其通押情況與司馬相如、王褒、揚雄等西漢蜀郡人相同，與東漢張衡不一致，由此判斷「《文選》收錄〈長門賦〉應該有相當的依據，該賦應係司馬相如的作品。」⁵⁴序偽賦真，可以說已成為定論。但是就〈長門賦〉而言，我們沒有《文選》以外的信息。嚴格說來，如果說《文選》的序是偽的，我們就失去了把該賦認定為司馬相如所作的根據。即使判斷它是相如之作，也無法探索其具體寫作情況。我們只能說南朝時圍繞〈長門賦〉存在著如此的小說。⁵⁵

我們要注意，〈長門賦〉的流傳模式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中的西漢辭賦完全一樣。圍繞西漢賦的傳說，在後代也仍然存在，而且不斷地增殖，可是它有時會迎合人們的興趣而變化，甚至違背史實。這個例子展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趨勢。在這個時期，文史逐漸各自獨立，傳說有時傾向於「文」，以至於產生小說。

西漢辭賦均與作者的傳說融為一體而流傳。在「文史不分」的文化傳統之下，傳說成為史家所注意，很多西漢賦由此收入史書而保存下來了。

⁵³ 《文選》卷16第8頁b，頁232。

⁵⁴ 簡宗梧：〈《長門賦》辯證〉，收於其著《漢賦史論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53-61。

⁵⁵ 關於《長門賦》與其故事，本人在中國文選學第十屆年會暨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（開封，2012年）發表論文，題目為〈《長門賦序》與六朝人心目中的司馬相如〉，論文集待刊。

儘管它有時傾向於小說，可是在自序、別集、總集等整理文學作品的手段成立之前，傳說就是保存文學作品的最有力的媒體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典籍

-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。
-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- 〔漢〕劉歆撰、〔晉〕葛洪集，向新陽、劉克任校註：《西京雜記校註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〔南朝宋〕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。
- 〔梁〕蕭統編：《文選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胡克家刻本，2003年。
- 〔唐〕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。
- 闕名：《古文苑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影印守山閣叢書本，1985年。
- 〔宋〕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費振剛、仇仲謙、劉南平校注：《全漢賦校注》，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。

專著

- 王興國：《賈誼評傳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馬積高：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。
- 萬光治：《漢賦通論》修訂本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簡宗梧：《漢賦史論》，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3年。
- 蹤凡：《漢賦研究史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。

期刊論文

- 谷口洋：〈試論兩漢「賦序」的不同性質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8卷第2期，2008年。
- ：〈論《史記》中秦末漢初的歌謠與傳說—圍繞荊軻、項羽、劉邦、呂后的帶歌謠的故事〉，《中國文學報》第78冊，2009年。（原為日文）
- ：〈漢末魏晉賦序興旺的背景——文學文本的整理與「文學自立」〉，《中國賦學》第2輯，2012年。

